

拓宽研究领域,大胆借鉴创新:人口学的出路

——“庆祝建国50周年人口学回顾与展望座谈会”综述

汪正鸣 蔡 昉

中国的人口研究在经过了70年代以来的大发展之后,正面临一个如何继续繁荣的十字路口。在世纪之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诞之际,回顾人口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存在的问题,展望今后的趋势,无疑对下个世纪人口学科的发展极具积极意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于国庆节前夕召开了“庆祝建国50周年人口学回顾与展望”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于景元、马侠、王跃生、田雪原、邬沧萍、张秉意、张龄广、宋新明、战捷、郭志刚、高春燕、高嘉陵、黄荣清、蔡昉等,于学军、郑晓瑛提交了书面发言。与会学者在充分肯定了中国人口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对人口学研究中的问题和人口学今后的发展趋势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1. 回顾与展望

1.1 社会实践的需要——人口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回顾

从事人口学研究多年的前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邬沧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前所长田雪原研究员、前副所长马侠研究员及与会的其他一些学者回顾了人口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历程。他们指出,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都是由于社会实践的需要,人口学也不例外。人口学从产生到现在虽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真正有大的发展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因此,在世界科学体系中,人口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作为世界人口大国,本世纪初期中国就有一批学者在进行有关人口问题的研究工作,但人口学得以成为一门科学,并引起政府的关注却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初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和健康水平提高很快,人口增长十分迅速。1949~1953年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相当于1840~1949年间平均增长速度的8倍,人口问题开始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

应当承认,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对人口问题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曾对人口问题有过一系列的论述。1956年,毛泽东在其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明确指出:“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配合党和政府的倡导,以马寅初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宣传人口理论,阐述节制生育的必要性,并由此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探索和研究人口问题的高潮。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对于人口问题的清醒认识并没有保持很久。1958年初,以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为代表的一些正确的人口观点受到错误的批判,许多很好的意见被认为是“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表现之一。从

此,有关人口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成为禁区,中国“人口列车”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运行。

对于如何评价建国 50 年,特别是最近 20 年人口学的发展,学术界是有分歧的。但是,学者们都同意,这一时期有关人口问题的争论与探讨,批判与反批判,对 70 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学的恢复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邬沧萍教授对此指出,虽然在反右运动中人口学研究队伍“全军覆没”,但批判与反批判的过程对后来人口学的复苏起到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奠基作用,并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数据资料。没有这一时期的工作,70 年代后人口学的研究不会恢复和发展得这样快。

70 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的普遍推行,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也开始进入全面的复苏。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各种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作为一个刚刚被打开的“禁区”,学者们对人口学研究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不但清算了过去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的一些片面认识,而且探讨了许多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主要体现在:提出并论证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的理论;恢复了“两种生产”理论并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论证了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辩证关系,批判了不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人手论”观点;论证了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性;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确立了比较科学的提法;提出并探讨了共有的人口规律问题;对如何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研究;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及人口规模的预测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等。

这些研究的开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推生计划生育国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到了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与此同时,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人口研究事业的资助,也对中国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其资助下,各地、各系统相继建立了一大批人口研究机构,研究人员队伍迅速壮大;开展了一些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客观实际的需要和国家的重视以及国际组织的援助,人口学成为“文革”后恢复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与会专家对中国人口学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生育率已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过程中,人口控制与计划生育工作开始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田雪原研究员谈到,进入 90 年代以来,已越来越倾向于从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角度来研究人口问题。不仅研究工作的实际发展如此,而且中央每年一次的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的名称也在变化:1992~1996 年召开的是“计划生育座谈会”;1997 年和 1998 年召开的是“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1999 年召开的是“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这表明,中国党和政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入的,而与此相适应,中国的人口研究实际上从 90 年代初开始已逐渐转向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来。

在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许多学者则更加趋向于对人口问题和过程的微观研究。随着对国外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成果了解的逐步加深,使利用模型和数理分析对微观层次上的人口问题进行定量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1.2 人口学:夕阳学科,还是朝阳学科?

由于研究视野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窄小,近些年来人口学研究的确出现了难以深入下去的现象,一时间人口学是朝阳学科还是夕阳学科成为关心人口学发展的人们心中的疑问。对此,几乎到会的所有专家、学者都肯定地指出,人口学将是 21 世纪的朝阳学科,人口学研究将是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

邬沧萍教授说,人口学研究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冷清的景况,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过去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生育问题,尤其是人口数量的问题上,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而事实上人口学研究的内容远不止是生育问题,人口的死亡、迁移、老龄化等等一系列问题或

是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或是刚刚开始介入。下个世纪将是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由高增长逐步走向缓慢增长进而达到人口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许多“未知王国”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的巨大与丰富的变化为人口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人口学学科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田雪原研究员在回顾中国人口学发展历程时指出,1980年5~8月间,中央就人口问题曾连续召开了五次座谈会,我们现在谈到的性别比失调、“四二一”家庭结构、人口城市化、劳动力、人口素质的逆淘汰等等问题,在这些会议上都已经提出,而这些问题现在仍然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人口学研究所面临的并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如何深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郭志刚和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黄荣清两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高嘉陵副研究员则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指出,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对人口发展中的许多规律性的东西尚未认识或尚未充分认识到,就连许多人口指标对实际工作的时效性很差这一基本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中国计划生育实际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郭志刚教授和高嘉陵副研究员还特别举例指出了在妇女生育年龄提高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内在缺陷更为突出,以至不能很好地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问题。其实,与之相似的问题在人口学研究中还有许多,其中有些我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而有些则是已经认识到,但还未去认真地踏踏实实地去研究、总结它的内在规律,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即使是在我们认为投入了主要精力并已取得不少成果的研究领域中,仍有许多东西有待我们去发现和认识。因此,人口学研究和人口学工作者不是没事可做,而是大有可为。人口学必将以其综合性交叉学科的优势,成为21世纪的朝阳学科。

2. 扩展研究领域——人口学面临的挑战

2.1 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要求人口学必须扩展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

正象与会的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人口学学科的迅速发展是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广泛实施分不开的,人口学研究的内容一开始就定位在如何为计划生育实践服务上。这一方面使中国人口学研究与计划生育实践紧密结合,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人口学科的发展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与实践的制约,研究内容显得比较单一,研究领域不够宽广。在70年代人口学恢复的阶段,人口研究主要是为刚刚开始全面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例如“两种再生产理论”的提出和相应研究。进入90年代以来,虽然在研究中数理统计和模型被大量运用,但是大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对现象和问题的描述与分析上,许多研究实际上在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在生育率达到较低水平时,人口学研究便似乎无法深入了,有学者形象地将其比做“船到码头车到站”,甚至给人以难以为继的感觉。座谈会上,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人口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相对集中于生育和与生育有关的人口数量问题,对其他问题则涉及较少。因此,要使人口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拓宽研究领域。

邬沧萍教授和黄荣清教授在对人口学的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指出,我们除了继续关注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外,还应积极拓展新的或者是以前涉及不多的领域,如在生育率已经降到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如何继续保持这种低水平并使人口结构趋于合理的问题;在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如何开发和利用中国最大的资源——人力资源的问题;数亿人口的迁移、流动和城市化问题;各民族人民如何共同发展的的问题,以及人口质量、人口老化、生殖健康、人口死亡率等方面的问题。在进行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同时,还应开展一个地区或一个系统范围的“中观”研究;充分考虑人口学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问题;在计划生育实

施 20 多年后的今天,如何深入研究正确处理好国家政策与人的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郭志刚教授还就目前衡量中国妇女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内在缺陷问题指出,即使是在我们认为投入了主要精力的生育问题的研究上,也仍然有许多工作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有些问题我们在理论上可能认识到了,但到底会有多严重我们并不了解。比如大家都知道,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将会带来婚姻挤压的问题,但是会挤压到什么程度,以及这种挤压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同时他还指出,虽然近年来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十分活跃,但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说清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很不充分。在可持续发展中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如何协调,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有机的整体模型,仍待人口学者进行艰苦的探索。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郑晓瑛教授在其书面发言中指出,在今后的人口学发展中,应大力开展人口健康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出生质量、儿童健康发展、妇女生殖健康、中老年健康等方面,使之成为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人口生活质量的重要研究领域。人口学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人口健康研究的开展也是对人口学学科建设的一个促进。

据有关的研究,与以前的预测相比,中国将提前两年,也就是在 1999 年内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战捷研究员指出,中国计划生育作为当前人口规模压力的调节器,是以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为代价的。人口老龄化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既有负面影响也有积极作用。对于人口学研究来说,机遇与挑战同在。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深入开展老龄问题的研究,以迎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2.2 与其他学科融会交叉——人口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20 多年来,中国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其中人口学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人口控制的理论与实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育水平的下降,现有人口学研究水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今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单从人口学的角度入手是解决不了的,必须发挥人口学的边缘学科的优势,拓展研究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例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目前中国人口数量控制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总和生育率接近或达到更替水平以下的情况下,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调整人口结构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其中对人口质量问题进行研究,就决不是单单人口学所能承担得了的,它需要医学、遗传学、经济学、社会学、营养学、教育学、法学等等学科的努力。人口学要解决这个大系统中所要遇到的问题时,必须与其他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融会交叉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要充分发挥人口学边缘学科的优势,也必须大力拓展研究领域,也必须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融会交叉,才能摆脱目前举步维艰的景况,使其在中国的科学研究体系中占居应有的地位。

邬沧萍教授在谈到人口学的基本任务时认为,人口学应当以人口变量为中心来研究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因素是如何影响这些变量的,同时人口变量又是如何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发挥作用的。对变量的研究应始终是人口学的核心。如果离开变量谈研究,那是绝对不行的。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交叉研究,而这正是人口学深入发展的生长点所在。

作为较早介入人口学研究的自然科学界的专家,航天部 710 所于景元教授对自然科学研究如何与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口学本身应是综合性的,因为人口是一个在进行任何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研究时都要考虑的影响因素。应用技术与基础科学的划分并不只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同样有技术的成分,例如以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为基础或以其作为决策参考而产生的政策、制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在方法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在有些领域中却是相同的。马侠教授则指出,在当前的人口学研究中,人口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交融较多,所出的成果不少,但是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如地理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学科相对较少。

由于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原因,70年代中国的人口学的恢复发展从一开始便独具特色。对此,从人口学恢复时便没有离开人口学研究的邬沧萍教授深有感触。他将中国的人口学发展概括了几个特点:第一,从一开始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的。从恢复伊始的“两种再生产理论”到后来的计划生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无不是如此。第二,从一开始便与实践紧密结合。由于庞大的人口规模的压力,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人口学从一开始便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政策和理论研究为己任,计划生育政策与实践一直是人口学研究的重点。第三,从一开始人口学研究便是与计划生育知识的普及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和深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计划生育能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第四,从一开始便与西方人口学有所区别。在西方,传统的人口统计学(Demography)与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y)是有区别的。而在中国,由于现实的需要,这二者的研究便融合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的区别。第五,从一开始便把对人口质量的研究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内容,这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学排斥人口质量研究的做法有本质的区别。第六,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从一开始便自发地形成多学科研究的特点,这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人员几乎都是“半路出家”的历史原因形成的。

邬沧萍教授也指出,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人口学在学科的建设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确定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第一,由于中国的人口学是伴随着计划生育实践的全面铺开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与计划生育共进退。这就使有关生育率的研究几乎成为人口学研究的唯一重点,由此造成了研究视野上的局限性,影响了人口学的全面发展。近年来人口学学科发展出现的停滞现象,与此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一方面由于大多数的研究人员(尤其是在人口学恢复发展的初期)都是“半路出家”,虽然在有些方面理论素养较高,但基本上没有受过人口学(人口统计学)的基本功训练,知识结构的欠缺使人口学研究体现不出自己的特点。而另一方面,一部分研究人员将人口统计学搞成了“玄学”,造成了人口学研究在另一层意义上的“曲高和寡”。第三,过快的发展使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机构林立,几乎各地区、各系统都有,形成了机构重复建设,客观上使原本就比较单一的研究内容更显得“僧多粥少”,许多所谓的研究成果实际上都是在低水平上的重复。第四,作为一个本身就具有多学科综合性质的学科,人口学研究并未真正做到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人口问题。与其他相关学科经常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体现不出人口学边缘学科的优势。

对于近年来一些人口研究机构纷纷下马,人口研究专业人员时有转业的现象,有舆论认为这是人口学研究事业停滞不前或走下坡路的表现之一。但会上有专家指出,出现这种现象并不一定是坏事,这实际上是对当年一哄而上的一种修正,恰恰是中国人口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人口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不在多而在精与各具特色。马侠教授对此感慨颇深,他建议根据学科建设和新形势要求,中国的人口研究机构的设立应以体现各自的特色并且能最大限度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原则,使人口学能够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3. 借鉴创新:人口学的生命所在

在座谈会上,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提到了人口学学科发展如何创新的问题。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在其书面发言中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发展经历了丰富的历程。但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中国人口转变和发展的研究,多是沿用古典的西方人口理论,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更没有什么创新的学说,而这正是中国人口政策制定者无所依从和计划生育政策理论支持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今后人口学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经验,总结历史教训,以创新的思维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并由此使目前仅仅停留在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的描述与分析上的人口学有一个质的飞跃,而这就需要人口学研究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必须承认,对策和实证研究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完善最终体现在它是否有自己的学科与理论体系上。因此,在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应当对其结论或成果进行综合与整合,在对问题的描述与分析的综合中去发现问题的实质与内在的规律性,这样才更有助于明确研究的重点和对问题更深入的分析。马侠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人口学研究在恢复初期的一段时期里,由于条件和人员知识结构所限,理论论述文章较多,而运用数理统计与各种模型进行微观分析的文章则比较少见。随着人口学的发展,国外的现代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开始被引入到中国的人口研究中来,近年的许多研究中大量运用了一些微观经济学概念与数理统计方法,但又忽视了对人口理论的研究,且基本上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与分析的水平上。以至有人称目前的人口研究为“方法精细,理论粗糙”。在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不仅是在研究方法要有所创新,在理论研究中也同样要有所创新。

在谈到创新问题时于景元教授还特别指出,科学研究的创新不只是指技术创新、方法创新、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创新,还有一个科研体制创新和组织创新的问题。我们的科研体制为科学研究实践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对其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现时十分活跃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都在搞,但是基本上是各搞各的,相互之间的结合欠缺。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科研体制与组织的不适应无疑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体制下,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不可能走向深入。

田雪原研究员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创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学科发展来说,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但就目前人口学的发展而言,从理论到体系已基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必须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密切结合。这就要求我们抓住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只有在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中抓创新,人口学的创新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在创新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的规范化问题,这对人口学今后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其中既包括研究方法、资料运用等方面的规范化,也包括学风的规范化。在目前人口学的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如何使我们的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尤其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王跃生副研究员从其研究历史人口的角度认为,应加大对微观人口的研究力度来提高对宏观人口变动的认识水平。目前在历史人口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的题目过大,动辄便是“通史”或“通论”,而如果没有断代研究上的突破,这种研究的基础就不会扎实。国外和中国台湾省都有一些学者长期研究中国人口的某一方面,或通过对家族资料的开发、整理来分析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动特征,并且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他们的研究思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实际上,小的研究题目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其最终成果的意义更大,甚至会成为重要难题的突破口。

(本文责任编辑:徐莉)